

YIHE TUAN  
YANJIU HUI  
HUIKAN



1983

义和团研究会

義和團研究會刊

目 录

1. 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侯 斌 1
2. 传教士、教民与义和团运动；宗教伪装下的帝国主义  
.....（美国）周锡瑞 21
3. 从档案史料看辛亥革命前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宋秀元 32
4. “四川义和团”质疑.....曹 蓉 38
5. 孙允荣率领的鲁北义和团斗争特点和意义.....商松石 49
6. 山东传教士的逃脱.....（美国）韦丰年 55
7. 北京西郊百花山区莲花庵村及其附近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张守常 58
8. 山东大学义和团运动讨论会简介.....刘天路 61
9. 续《八十年来义和团运动史论文目录》..... 65

# 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

侯 斌

戊戌政变后那拉氏、荣禄的对外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与列强关系如何？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有关说法历来不一，至今仍是个谜。我的看法是：那拉氏—荣禄在政变后对列强的侵略始终是力求顺应，对义和团的态度一贯仇视，坚决镇压，他们在这些方面亲无不同之处，不过在表面上还要故作分歧。原因是戊戌政变后王公们搞的废立活动随即开始，那拉氏要永保独持“大柄”，就必须保留光绪帝位的虚名，必须反对废立。为取得主动，她自己明主废立，暗则用荣禄阻挠，反对废立。荣禄也因此显得与那拉氏不一致。为反对载漪掀起的两次废立活动，荣禄连犯了四次“失误”。最后那拉氏也不得不自出马上阵。当废立危机渐趋消失，她就动手屠杀义和团了。这也就是义和团运动中又夹杂了清统治核心集团的两大派争夺“大柄”的斗争，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考查那拉氏、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所做所为，揭开这个盖子，进一步揭示清统治集团中的派系斗争和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 一、那拉氏的“反客为主”与刘坤一的《电奏》

维护“祖宗成法”是戊戌政变中那拉氏的王牌，光绪妄变成法，根据“家法”应废黜，那拉氏为政变找藉口，又过分地伤害了光绪，更造成了光绪必废的条件，可那拉氏要“垂帘”，永保独持“大柄”，则又只有以保留光绪“皇位”虚名为前提，因此政变后清统治核心集团在权力的再分配上就以光绪是否应废黜，谁来继大统展开了搏斗。这场搏斗时缓时紧，可总的形势是愈演愈烈。共计三大回合，在第一回合中虽尚未与义和团运动相关联，但在后来的两大回合中相互的关联就越来越多，为此，对第一回合也得加以交待。

戊戌政变固然是那拉氏代表封建统治阶级为反对变法采取的行动，但从她自己看更在于要借机再“训政”，这不仅表现于变法之前，变法之中，同样也反映于政变之后。

当变法尚未正式开始，保守派惶惶不安时，那拉氏就动过手：“初二、三月间，荣禄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西后复行垂帘。先谋之于兵部尚书徐郙，徐郙曰：“奈清议何？”事遂沮。稍后，荣禄党“李盛铎又欲联御史连署请垂帘，奔走数日”，又“不能得”而罢。

垂帘既阻力重重，那拉氏与荣禄也就变换手法。一面加紧政变部署，另一面则有意给光绪点自由，先予之而后取之了。于是那拉氏对光绪讲：“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辨

发不剪，我便不管。”“当皇上之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因请者，西后笑而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自此无以为言者”，荣禄就讲得更露骨：“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真也为时不久“京中哄传”“皇上入〔天主〕教”，皇上将改衣冠，剪辫发”，“绝无影响之谣”份份出笼，而环绕“天津阅兵”种种说法，就更在使康、梁等人惶恐上当，轻举妄动，政变终于有了借口。①

虽然政变后新法必废，“君子们”必被惩处，但那拉氏与荣禄原所予定的局面也只不过是“训政”，光绪“皇位”虚名仍是要保留的。所以正式宣布政变的八月初六日上谕，就仍以光绪出面：他“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光绪本人身体也是健康的，“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

形势的严重恰是在这道上谕颁发之后，这不但在于王公与保守派大臣对变法的恐惧与仇恨突然得到了发泄之机，更在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分享成果。这些都又集中到一点：强烈要求废黜光绪。那拉氏立即掌握这一情报。她对光绪并无顾惜，废黜了甚至于可以使她出口恶气，但是她首先要想到对自己的后果。她是必须假借光绪皇位的虚名，才能永保独持“大柄”的。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怕的就是使这一情况立即公开化，一公开，光绪妄变祖宗成法，就只有按“家法”来制裁。还有那拉氏与荣禄为政变制造的种种借口也都成了加在光绪头上的罪状。废黜光绪就更注定了，并且无法挽回。怎样才能避免诉之“家法”制裁，还能延缓时间以求对策？在形势与时间都十分紧迫的情况下，那拉氏只好“反客为主”了。“反客为主”也确有效果，既然她主动提出要废光绪，王公们也就皆大欢喜，她掌有决定继承人选的大权。王公们都向她献媚争宠。她不仅先稳住了脚步，大大主动，并可用似乎既现实又积极的态度来提出：办此事她有很多难处，大家务须体谅。光绪还是一国之君，为了应付列强与天下臣民，则更换的方式就只能以“病重”、“病逝”再另立新君。这一狡谋又得逞。于是“宣诏天下名医”出笼。本来王公们的王牌——绳之以“家法”的公然废立就也被搁置起来。而那拉氏的这一套本为用来欺骗王公，她所求的实在目的则正好相反，于是那拉氏就与热衷废黜光绪的王公们相较量，而她那“反客为主”的手法又决定她只能处于暗中，因而就得用荣禄来当她的助手。

在光绪被宣布“病重”后，那拉氏与王公的斗争也就进一步发展，此时王公们迫不及待地要对光绪下毒手，而那拉氏则尽力在保光绪的命，到此时都逐渐明显了，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讲：“自八月初十日至卅日之间，杖杀之宫女内监其数甚多，闻皆在怀中搜出枪刀等器，西后谓其欲行刺已，故杀之云”，梁与那拉氏是死对头，他的这段话只有与他所依据的《时事新报》（日本）报导原文相对照才能清楚，报导原文：“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也载于《戊戌政变记》）由此可见那拉氏讲“行刺已”，只是为了名正言顺用“杀”来制止对光绪的谋害，也就是她与王公们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谋刺既不成，形势就又一变，梁启超说：“自九月以后，立储易位之议，道路传说，初议立庆亲王之子，又议贝勒载漪之子，因有宗室二人坚持不允，大臣亦有以为言者”，废黜光绪才又未成。马士也有类似的叙述：政变后清贵族“集团内部有许多各种不同

利害关系，西太后也不能排除他们的互相猜忌，10月23日（按旧历为九月初九日）当皇帝的最终命运还悬而未决的时候，一件内廷阴谋大约在慈禧明知故纵之下爆发了，把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亲王奕劻的十四岁儿子溥仪上皇位。这个计划为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的两位宗室（荣禄或许是其中的一个）所反对，慈禧在他们的高人一等的洋务知识方面不得不让步，这次危机使西太后赐给醇亲王的两个儿子载漪（瑞王）和载灃以上方宝剑”。②

尽管马士的说法有不少错误（如荣禄并非宗室。载漪两兄弟是宗室，可当时又未在总理衙门任职），还把仅仅是“计划”——废立予谋也当做了已付之行动的流产废立来叙述，不过它也反映出亟亟于谋废立者，最热衷搞废立的还是那些王公们，也正因为王公们各有派系，还都热衷于非分，就更矛盾重重，就给那拉氏以利用机会，使废立预谋流产。

按当时王公各派实力而言，奕劻一派是最强的，奕劻又甚得那拉氏宠信，当然非分之想更强烈些。第一次废立高潮也就以他为主而掀起。但真要讲到“继大统”，则奕劻一支可能性又微乎其微了。这在于继承必须讲家法，即先尽近支，奕劻是远支，怎能轮到？再则“为穆宗（载淳）立后之约”已两次明谕天下，如废光绪（载湉）再立的就必须是“溥”字辈的，奕劻之子也是排“载”字辈的，更注定奕劻的指望只能落空。

那拉氏当然“明知”奕劻的这两大致命弱点，为何还“故纵”？其原因就在于利用奕劻的失败来刹住王公们热衷的废立，并借此来加深王公们的相互矛盾，相互牵制，就更便于她对各派的操纵，制止废立活动。

使奕劻预谋废立失败还在于“大臣亦有以为言者”，这“大臣”就是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在光绪廿四年八月廿八日曾《电奏》力反废黜，梁启超为何只含浑而言“大臣”不点出刘坤一的名，其原因在于刘坤一早已与光绪闹矛盾。甲午之战他不支持光绪，甲午战争后光绪也一直不让他返两江原任，后来还是那拉氏“竟以懿旨压制皇上而回任焉”。变法期间刘坤一对光绪“交办各件，任意迟延搪塞”虽屡被光绪申斥，竟也置之不理，仍只“观望于直隶”有持无恐地对抗光绪。刘坤一既与光绪这种关系，梁启超当然不愿点他的名，但是为什么在这满朝汉大臣和封疆大吏都噤若寒蝉的情景下，刘坤一又竟甘冒特大风险单独出奏反对，还在“疏尾自加”：“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载之忧”。因此他这《电奏》在当时的震动很大，也大为许多人吹捧，是“近代仅见”。“此南皮（张之洞）所不能言。”③

大可异者刘坤一的《电奏》到北京正是在废黜阴谋最紧迫之际，因而也就正与“宗室二人坚持不允”相配合。奕劻所谋求的废立，也才未敢付之于行动就流产了。事情为何如此巧合？这又与刘坤一为什么敢于如此做同一原因，即他是在荣禄的“私意阴示”下发的《电奏》④那么，荣禄又为了什么要“阴示”呢？他是在执行那拉氏的意图。

那拉氏改变后的原有打算也就只是“垂帘”，并不废光绪，这在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她不能取光绪而代之，她只能垂帘。垂帘也有限制，即限于母后（太后）。光绪如被废，由“溥”字辈继位，她也只好升一级为太皇太后，就不能再垂帘了。这个麻烦她在穆宗（载淳）去世时就已遇到过，她为了“大柄”，才不给载淳立后，硬来个“兄终弟及”，让光绪（载湉）继位。她虽垂帘，但也不得不当即宣布光绪后的大统仍

旧归穆宗，可就连这样，在光绪五年安葬载淳时，还又出了个吴可读，为大统所归，竟然“死谏”，朝野大为震动。那拉氏只好被迫再次诏示天下：“其继大统者为穆宗皇帝嗣子”。这样就将再立“载”字辈的一条途径全堵死，那拉氏如废光绪就无异于自绝了她再垂帘的依据，即使能再立“载”字辈，既公然违反封建法、理，近支王公绝不肯干休，又很可能天下大哗，那拉氏威信就会大损，她绝不能这样做。

如果立个“溥”字辈的，她虽成为太皇太后，但仍能垂帘，即使如此，那拉氏也不肯干：因为按清朝家法君幼得再设摄政王，顾命大臣，或议政王，新君又有本生父及其一支和一党，这些人力主废光绪，为的就是谋取这类身分，以便参与大政，争夺“大柄”，这些人又势必是近支，与近支斗争就很困难，那拉氏虽充分的利用了奕訢和奕譞，但又特别猜忌他俩，费尽心机与他俩斗，她当然不愿这类情况再重演。再说新立的即使也是幼君，那也与光绪完全不同，她与光绪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就在谁持“大柄”。政变，再度垂帘就是这一矛盾的解决，此时光绪的羽翼几乎全被她拔除，本人也全被她控制，成了十足的傀儡，光绪活一天，她也就名正言顺的独持大柄一天，而新君则总有“亲政”那一天，到那时那拉氏要想独持大柄就更难，而她也越来越被权力欲所支配，活一天就得独持大柄一天，这就绝不能废黜光绪。

以那拉氏的精明，她早应该想到这些，但政变前她亟于“训政”。整个保守派都捧她为救世主。以往她争大柄每战必胜，早使她过于自信。此时朝无重臣，王公皆庸碌之辈，更使她大意。就完全忽视了政变后的保守阵营必有重大变化，政变顺利，接踵而来对她的确是意料之外的威胁，还十分的紧迫，虽然靠她那莫测的君威，不得已的“反客为主”办法暂时撑住场面，但她最紧迫的任务却在于如何能形成一个由她支配的反废黜势力，使她能有所借口来对抗王公，否定废黜。为此必须有个确实信得过还得力的人来配合她演双簧，这一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荣禄。为此才不得不变更政变时已安置好的布局。在宣布光绪“病重”的同时，急忙内调荣禄。不仅主军机处，参外务，还仍统武卫五军。于是变法时与光绪是死对头的荣禄，也竟然突变为保光绪，反废黜的主将。奥妙就在那拉氏的需要。

荣禄虽执掌了军政大权，对那拉氏的忠诚也无可怀疑，但他既非宗室，更不是近支，在废立上也就不敢发言，更不能公然反对。这些又决定他搞反废立活动的特点：只能是以隐蔽的为主，以他人出面为主。当然受他支配的人，与他得有深交，早就与他同党于那拉氏，也得知道那拉氏、荣禄的处境，那拉氏的真实意图。知道这些很重要，因为搞反废立活动必然会招来麻烦，荣禄又无力予以承担，到关键时刻就得靠那拉氏来给解围，不然就会担特大风险，也就不敢干了。这些方面刘坤一及其《电奏》一事，就颇典型，例如刘坤一在《电奏》后的《复冯莘垞》信中讲“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宁家”，就反映了刘坤一对那拉氏要荣禄承担的角色，她俩的处境都是很清楚的。信中又讲“前次电奏，不好措辞止含浑进谏，希冀动听”。又道出了刘坤一虽明知自己的难处，但仍力求“动听”满足那拉氏的要求，那拉氏也真对刘坤一负责：在《电奏》后一个多月，“言者论其（刘坤一）左右用事。诏诫其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他就以《披沥自陈吁恳开缺摺》硬顶了回去。结果反下上谕挽留，第二年四月刚毅又赴“江南一带查事件”刘坤

一先提前请病假，等刚毅到了江南，他上的《哀病难支恳恩开缺折》也到北京了，那拉氏亲自出面，懿旨：“赏假一月”，赐“人参四两”。<sup>(6)</sup>刘坤一两江总督位更加安稳。这就充分说明荣禄搞的正是那拉氏一套计划所决不可少的部分，荣禄、刘坤一的活动则又全要仗她的庇护，他们就这样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演双簧来对付王公们搞的废立。

不过那拉氏既已处于困境，想再摆脱也就不易，还往往顾此失彼，弄巧成拙，在反第一次废立活动时，为了对付奕劻，她利用了宗室，近支，惇王的两个儿子——载漪、载灃，从当时看惇王这支既没有什么实力，也未自成派系，载漪两兄弟又皆是庸碌之辈，马士所说的赐给他俩“上方宝剑”也并无实据，不过，正由于他们是近支，他们的子侄也才最有继大统资格，并借反奕劻有功势力日大起来。后来的两次废立活动也就以载漪为主。又如政变前那拉氏为尽快取得“训政”，有意加给光绪“吃洋药”、“奉洋教”之类说法，后来也就成了载漪等人企图强制那拉氏废黜光绪的口实。这些又都出于那拉氏的意料之外。

## 二、“只立不废”与荣禄的第一次大“失误”

戊戌政变的第二年，义和团运动起山东。这年的十一月，时任山东巡抚又与义和团运动关系较大的毓贤被撤职，以往史学界多认为这是在列强压力下清政府被迫的处置。实际上，荣禄决定由袁世凯去取代毓贤早成定局，只不过在执行时不得不假列强干予为名。荣禄此举不但反映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仇视，而且还是他为贯彻那拉氏对内、对外政策必行的部署。可是恰在此时，载漪搞的废立活动也渐入高潮。毓贤是刚毅的人，荣禄撤了他的职，直接侵犯了刚毅，他与刚毅之间的矛盾加剧。当荣禄全力对付废立被迫赴东陵躲避之际，在刚毅的影响下发布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在对义和团运动的处置上荣禄犯了第一次大“失误”。

正式决定以袁世凯取代毓贤的时间是在光绪廿五年的十月中旬，关于此事尚秉和撰《正定王公行状》说：“（光绪）廿五年十月袁公晋京视暇，擢山东巡抚，命未下，即檄出（按指王士珍）往东视察一切，公即携骑率二人历堪登莱青沿海各要隘及屯兵处所，海防及地方情形戎马驰驱，风餐露宿，月余蒞事，比袁公赴东抚任，归遇于德州”。文中所谓“视暇”，即十月初十日给那拉氏祝寿。又据廿五年十月廿日《汇报》报导：初十这天“端王、庆王、荣相、袁侍郎、董、聂、宋三军门在便殿视暇，实则密议军机，除亲信官辈二人侍太后之旁，皇上亦不在侧，自后数次集议非在荣相私第，即在宫中及瑞王府第，前者荣、庆十分冰炭，经太后剴切诤诫已无门户之分。”由此可见在十月中旬就已定下袁取代毓贤，那拉氏、奕劻、载漪都点头同意，王士珍也被派去山东，而此时列强公使们对毓贤尚未提出过严重的异议。

为什么说此举是荣禄为贯彻那拉氏对内、对外政策必行的部署，这就与早在这年夏天荣禄就已定下来要用袁世凯取代毓贤有关。这须从两方面来加以交待，一是那拉氏为了维持对内统治，首先就要顺从列强要求，加强与列强的勾结，从而增强对内镇压能力。早在戊戌政变前后英国勋爵贝福恩来华，建议清廷要免于瓜分，“有灵活确实之法在，中国诚欲全保他人之产业也，必合陆军为一大支，而立国军。”英并愿“遣其陆军将

帅代练国兵”。为此贝福恩“往拜军机大臣荣仲华中堂禄”，“中堂云：延聘外国大小武弁训练中国陆军，理因甚合，且已有旨明谕张之洞矣，因问宜用何法，以行此事，请君开一清单。”继而“中堂乃径问曰：中国倘以全军，置诸英将辖下，一旦中国与外国有事，英其乐助之乎？”反映了那拉氏、荣禄为能苟存，不惜卖身投靠心意之切。此时，正在政变之后，那拉氏为统治全国，对抗王公的废立，已令荣禄统武卫五军，贝福恩提出要那拉氏“全保他人之产业”，即“欲避险而安，必后外而先内也”，所谓“立国军”，即“先从事内地之陆军”，并对旧式军队加以改造，“参酌乎英、法、德三国之军政，聘其国之大将，以时训练纯熟，而综其权于京师”。这些那拉氏正一一照办，对练新式陆军也正在下大本钱，但她最感兴趣的又还没能完全做到的，则在“综其权于京师”，因此对这一点就要进一步安排，也拟好了计划，这就是将“通国之兵汇为一大群，再由大群中分布各省，成为数小群，如此则兵权全握于朝廷。”<sup>(6)</sup>计划怎样逐步实现，荣禄掌握的武卫五军下一步将向那省去分布，就既关系那拉氏的整个对内、对外政策，也关系到荣禄实力扩张的需要。已势在必行，只是早晚而已。

那拉氏面对的对内、对外统治的第二种情况又加速上一计划的实现：派武卫五军中的袁世凯军去山东。当时那拉氏为了她的统治，也得尽力维持残存的局面，可当时德国在山东的侵略不断加剧，刘坤一在光绪廿四年九月，第二年的二月、十月多次向荣禄进言：“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惟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还怕再形成1898年“各国群起效尤，择肥而噬”的情况。建议“莫如自占先著，予以重兵赴沂”。最好将荣禄所统“袁、董、聂、宋等军拨一全军赴沂”，“拱卫三辅，而全体皆握矣”。<sup>(7)</sup>二十五年春，德又出兵侵占日照，荣禄就按刘坤一意见以“操演行军”为名，派袁世凯军去山东，袁到山东后也知道“内中”（指朝廷）“必无高着，不过只做死棋眼耳”，但他和他的密友徐世昌都看到如能将山东军政都抓在手中，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将起极重要的作用，徐世昌就对袁提出了。袁在四月份的复函讲：他到山东后，毓贤“密派两员扎发各条，飭来查本军有无滋扰情事，其予有成见故来吹求”“可笑可恶，已详告略公”略公即荣禄，“详告”则在借此机会按徐世昌所建议要把山东抓到手做些准备，所以袁世凯的信接着讲：“尊语先伏一线俟撤回再藉此作文，老天不予人无路，今果有此两机会，妙哉，妙哉”。<sup>(8)</sup>

一个月后，即这年的五月袁世凯上了一摺：“夷情无厌，后患伊于胡底，且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兼由于此，倘兹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餉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犯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机，当可渐渐相安，藉保我自有之权”，这“不资以可藉之口”以及奏章中所述“东省官吏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官吏大半不谙约章。遇事无所依据”就都是在攻击毓贤，而所谓“不予以可乘之机”“扼要屯驻数千人”<sup>(9)</sup>则又在自荐，袁世凯是荣禄的心腹，并早向荣禄“伏一线”，这个奏摺当然已是摸透了荣禄的意思，即已在荣禄点头认可后才上的，荣禄既同意他上此奏摺，则就已同意将袁世凯安插于山东去取代毓贤，故此事早在1899年夏就已开始酝酿，到十月中旬已定局。

在十月初十左右就正式定下要撤毓贤，也可以从刚毅此时异常的举动得到证实。刚毅在由广州赴上海途中就已接到旨令，着前往四川办事，可在十月初十刚毅却匆忙离开上



海，在十九日赶进京“请安”（《京报》），虽然此时毓贤的命运已无法挽回，但是荣禄再指斥和令他赴京“陛见”的谕旨，就都要借助列强的干预，正好美公使接二连三地提出抗议就都被荣禄用上。<sup>(10)</sup>不过最后也没有公然撤毓贤的职，袁世凯也只“署”山东巡抚，其原因就都在刚毅已回北京，并加以干预。

十一月廿四日是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的大喜日子，而就在这一天，京城里的侍讲学士、御史们的“连台本戏”也开场，直到十二月初九收场，整整半个月。前后六个人上的《摺》和《片》达十件，口径一致，都是反对处理山东“仇教”用“剿”，并以袁世敦（袁世凯的二哥）制造了平原事件为例，得出“为今日之计，惟有先令袁世凯北归”的结论。这就显然是刚毅组织的对荣禄的反击，最后十二月十一日颁发了“念会亦有别”的上谕，“戏”也就收场，似乎刚毅大胜，然而袁世凯仍“署”着山东，就只能算打了个平手，再查下《京报》十二月初七到十五日荣禄去东陵了，<sup>(11)</sup>则刚毅不过是趁他暂时不在军机处之机促成颁发了这道上谕而已。荣禄此时去东陵则又与他所承担的反废立活动重任有关。

那拉氏在废立上的阳一套，阴一套就注定了她必然越来越被动，荣禄的特点又决定他只能搞隐蔽活动，借他人之口而言之。为反第二次废立斗争，荣禄虽再次求助于刘坤一，刘虽也仍旧十分卖力，可作用已不大。<sup>(12)</sup>这样就不得不求助于李鸿章。据荣禄的亲信陈夔龙说，荣禄亲口对他讲过此中的经过：时“一般熏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那拉氏）惑之，囑文忠（荣禄）从速办理。此已亥冬间事也，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适合肥李文忠外任粤督行有日矣，来辞公，看公容貌清癯，曰：何忧之深也？公谓文忠曰：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而我受恩至渥，责备亦最严，近数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以教我，因密语非常之变恐在目前，（李）文忠听未终，即大声起曰：……各国使臣，首先抗议……”<sup>(13)</sup>这样，接下来也就是《清史稿》所说：“时太后议废帝，立瑞王载漪子溥仪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即“只立不废”，实际是又暂时地将废立往后推延下去。

陈夔龙的这段话真道出了不少重要情节。但是陈夔龙又只讲了荣禄、李鸿章两人最后的登场表演，并将他俩事先的串通有意避讳了。这点参考一下其他有关记载就可清楚，如章华撰《语林》讲：李鸿章时“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荣禄突往访，密述“太后将行大事”，请李对外使“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督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sup>(14)</sup>章华所述有一点是很客观的，即只有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之后，才有借口宴会列强公使，也才能假托与公使有过这番对话来“权词以保帝位”。再则李被授两广前，正是他生平最不得意之时，当时京内斗争激烈，他当然要谋个安身之处。提供“权词”后，卷入了斗争，更得设法脱身。因此荣禄即要李鸿章帮忙提供“权词”，李鸿章为自己的利害，也就自然要提出“授我以两广总督”，因此荣、李二人

是事先就已串通好了。那拉氏先外放李两广总督，李则负责提供无法对证的“权词”。这样继荣禄、刘坤一之后，又有一个与光绪也是不对付的李鸿章，转而来保光绪的帝位了，奥妙也仍在那拉氏。

李鸿章外放两广的日期是光绪廿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这时荣禄必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际，也就是载漪与“熏心富贵之徒”所掀起的废立活动渐趋高潮之时。荣禄对策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借重李鸿章来编造一个能吓唬住王公们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最多也只能起到不废光绪而已。为了安抚载漪，那拉氏就只好被迫再让步，立大阿哥。不过立的只是“皇储”，光绪并不要让位，也就是“只立不废”，并可无限期地将废立推延下去。但是要实现这点“只立不废”，也是极其困难的，首先它明显地违背了不预立皇储的祖训，如何防止有人企图指责。其次，载漪等人显然不会满足，怎样加以控制。三是不明真象的人更会认为这是那拉氏一心要废黜光绪的步骤，也可能要加以抨击。这些由谁来承担？为此荣禄把徐桐、崇绮硬请了出来。

徐桐的高足赵炳麟讲：时“请废立者接踵”，“大学士荣禄者夙巧黠，知废帝必来天下兵，难之，欲立皇子徐上告病。大学士徐桐颺之。前户部尚书崇绮其女为穆后，乞休家居。绮夙善桐，桐因荐于荣禄，言绮可共大事。禄、桐再三诣绮，遂以懿旨起绮于家。立端王载漪子溥儀为大阿哥后穆宗”。又说：“绮之起也，其门人唐椿森往贺之。绮曰：吾不眠三宵矣。兹事责重，吾身家以之”。<sup>(15)</sup>这就是徐桐、崇绮都是由荣禄硬拉出来的，为什么要硬拉他俩人充当配角，首先在于他俩都在旗，是名扬天下的理学大师，门生故旧多，在士大夫、满族、蒙族中都有较高的威信。崇绮是同治的老丈人，也就是“为穆宗后”，新立大阿哥的外祖父。徐桐在光绪五年曾带头反驳过吴可读的“预立大统”。正由于他俩有这样的一些资格，因此也就可以成为那拉氏、荣禄的挡箭牌。荣禄拼死命的去拉，拉出来后那拉氏又加以百般恩宠，就都在于“只立不废”是那拉氏、荣禄精心设计出来的，并为那拉氏仍能独持“大柄”而服务的。

当然最后还有场压轴戏，就是当荣禄已取得李鸿章提供的“权词”，又硬把徐桐、崇绮拉出来了，他就去“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王，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痛心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忌回，劝念勿哭另作计划，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儀暂屈为大阿哥，入宫养育，承嗣穆宗”。<sup>(16)</sup>“内禅之议暂止”。

由上述可知，在此期间荣禄正全力以赴对抗废立，就已顾不得刚毅反击他的“连台本戏”。荣禄要搞“只立不废”就有许多细节都要仔细推敲，安排。惟恐走露消息，更怕载漪等人强迫他表态，追问李鸿章的“权词”（当然李鸿章已溜之乎也了），这样就得找个借口去东陵躲避，不想又被刚毅钻了空子。

“只立不废”在那拉氏只收到一点效果，《清史稿》讲立大阿哥时宣布“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儀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以各公使有异，同谏止”。<sup>(17)</sup>即奕劻被分化出来，站到那拉氏一边反载漪。但那拉氏的“只立不废”的圈套虽暂时的套住了载漪，可也就套住了她自己，她与载漪的矛盾，虽然由于演的是双簧，她的真实面目人们也仍还弄不清，可是荣禄面目已暴露，这样压力也就向他集中。

### 三、那拉氏、荣禄处于两症并发困境中的挣扎

光绪廿六年，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载漪借机又掀起了最激烈的一次废立活动。正当那拉氏、荣禄在此两症并发困境中挣扎之际，列强又插入一手，矛盾更复杂、激化。两症并发既是清王朝末日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也与荣禄在这一时期所犯的三大“失误”有关。下面就以这三大“失误”为线索来谈。

荣禄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犯的第一大“失误”是他从光绪廿六年二月卅日起请“病假”，到三月廿日“假满”，四月初一又请“病假”，直到五月初十才又“假满”，整整请了六十天的“病假”，直隶义和团运动在此期间也兴起。荣禄请“病假”是因自立大阿哥后，载漪“父以子贵、渐预朝政”。他和载勋都分别被任为宗人府的右宗正和左宗人，控制了宗人府。载漪一伙也多被任命为八旗各旗都统（如载瀛镶黄旗护军，载勋正兰旗汉军，启秀镶白旗满洲，崇绮正红旗汉军）或管理健锐营（载澜），御鸟枪处（载瀛），势力更庞大。载漪不满“只立不废”，自然对荣禄施加压力也大。其次是总署的突勳在第一次废立之争后就与荣禄“十分冰炭”，此时虽有所缓解，但只求自保、不愿与载漪冲突，仍不与荣禄合作，最使荣禄头痛的是刚毅，他俩政见不同，争权矛盾也大，因毓贤引起的一场斗争，虽到这年二月十四日那拉氏予以调解；同时正式任命袁世凯、毓贤分别为山东、山西巡抚，但荣、刚二人政见分歧依然，《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是刚毅的主张，已成了清政权处置义和团运动的基本政策，荣禄工作也难，只好请“病假”，“高卧私衙”了。

荣禄对义和团运动始终很仇视，不过，他虽力主镇压，可又很轻视，这些从他在三月份复法天主教教樊国樛函中均可看出：“顷接惠函备悉义和团蠢动……前次梅提督在任邱一带击毙擒获拳匪数十名，办理尚称得力。不谓近日仍未敛戢，复有定兴等处戕毙教民之事，闻之惋恨殊深。敝恙尚未大愈，一时不能出门，至为焦灼。刻将原函交总署，速知照直隶总督添派重兵，妥为弹压保护，并将滋事匪徒严拏重惩务绝根株。”<sup>(19)</sup>荣禄虽磨刀霍霍、但他这一套已不仅无效，还将火上加油。这在于《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承认了，不“滋事”、不“为匪”的“守望相助”组织的合法性，直隶义和团的组织已迅速发展。教会、洋教士到处建立武装据点，组织教民武装，四处反扑，更使义和团遍布直隶，并与教会武装相对峙。荣禄可派的“重兵”有限，一处“弹压”不住，也就处处响应，四面开花，“严拏重惩”更使义和团与清军矛盾激化形成突变。四月中旬涞水县高洛村没“弹压”住，就成了突破口。清副将杨福同去残酷镇压，义和团就反击，将杨福同也击毙。荣禄调聂士成军五营去涞水、定兴镇压，义和团就又以据涿州，焚芦保铁路、电线相对抗，形势终于突变。此时荣禄虽仍在“病假”中，也亲自出马“率兵队数百名到马家铺，再至丰台，将全村逐家搜检，如抄有车站物件，即行斩决。”“飞檄驻南苑之武卫中军马步队廿营，全赴京西相机剿办。”<sup>(20)</sup>裕禄聂士成此时也拟好了，“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道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紫谿、定之营，三路兜截”的计划，送交荣禄批准执行。可在此同时，五月初七日发出上谕：令荣禄“设法弹压解散”“不得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sup>(21)</sup>“三路兜截”

计划落空。

在这关键时刻那拉氏为何竟不支持主剿的荣禄，原因之一是刚毅一派坚决反对荣禄的做法，仍坚持自己的那套。到五月十一刚毅就亲自去涿州“开导”义和团：“赶紧撤队，各散归农。”之二是五月初六（1900年6月2号）英公使“从一位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获悉：宫廷内的形势十分紧张。慈禧太后希望镇压义和拳，但她不敢这样做，因为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其他保守的满人对义和拳予以支持，同时也因为义和拳人数众多的缘故。”同一天法公使也“从权威方面了解，慈禧太后准备逃往陕西的西安府，因为义和拳对她本人采取了敌对的示威行动。”<sup>(23)</sup>由此可知宫廷内斗争激化。但载漪究竟为什么反对荣禄镇压呢？五月上旬义和团运动虽在畿南兴起，但还未正式进入京城，而当时清政权在直隶却拥有大军，正如许多史学家所指出：按当时清军兵力不仅可守卫京、津，也有能力镇压，那么，从清军看，情况又如何？相联的还有一个问题，义和团既尚未大规模入京，如何能对那拉氏举行“敌对的示威”，还竟使她要逃“西安府”？要解答这些疑问就只得与荣禄又犯的另两次大“失误”结合起来考查。

荣禄在义和团时期的第二大“失误”主要犯在董福祥甘军上面。

荣禄当时虽掌武卫五军，在直隶却只有聂士成军，武卫中军和董福祥军，聂士成要守天津，此时主要兵力又陷于保芦保、芦津两铁路。武卫中军正如刘坤一向荣禄指出：“多系荐引凑合而成，缓急恐不足恃，”荣禄又没来得及按刘坤一建议“分别遣还”，另行召募办理<sup>④</sup>。这样能守卫京师，战斗力较强的也就是董福祥军，可是《清史稿》讲宗室寿富当时曾“上书荣禄言”：“董福祥军宜托故令离畿甸”，荣禄竟“不省”，结果铸成大祸。<sup>(25)</sup>这又是什么原因，陈夔龙讲了些情况：“董福祥带武卫后军归荣相节制，诿载漪暗相结纳，引为已用。”“总缘彼有恃而不恐，盖欲早举非常之事，而事与心违，大欲未遂，矫而出此倒行逆施（按此句陈夔龙原意指攻打使馆一事，致成两宫西幸之局，而国事危如累卵，已亦身败名裂，哀哉。”<sup>(26)</sup>即董福祥已转变成载漪所“持”之一，荣禄不将董军调离当然是他的一大“失误”，可是董军在甲午后就留在直隶，廿四年九月董军还在“芦沟桥与铁路工程司洋人面殴。”列强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将董军撤离直隶。那拉氏、荣禄宁愿给列强磕头，还是硬把董军留在畿甸，接着那拉氏又以懿旨：赏白玉翎管等“交董福祥祇领，以示优眷，并著赏给该军兵银一万两……”。<sup>(27)</sup>此中奥妙何在？原来董军负有特殊任务：镇慑王公，防止武力废立。这又是因为王公们搞的废立活动也还有它的一定实力。

从当时的北京来看，它是清政治中心，也是“旗人的根据地”，旗人特别集中，对变法、政变的反应也大，变法要改变“祖宗成法”，一般旗人已极为反感，又令他们“自谋生计”，原来月月可有的钱粮——“铁杆庄稼”危险了，就仇视，也很易听信那拉氏制造的种种谣言，当然也就拥护政变，并支持废光绪，成了王公们要搞废立活动的社会基础。廿四年那拉氏“万寿”之后还特赏閒散宗室觉罗，八旗官兵钱粮一月或半月，<sup>(28)</sup>就在于她也清楚一般旗人的情绪，有意拢络。

更严重的是想搞废立活动的王公自己就掌有一定的兵力，如奕劻就掌神机营，在他那废立预谋中就有“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太后之诏而举事。”<sup>(29)</sup>奕劻预谋虽流产，载漪又乘机逐渐掌握了一支比神机营还要庞大的虎神营。载漪也有搞武力废立的可能。

董军必留畿甸。

到此时北京又有变化，先是四月下旬“满洲贵族世家入于义和团者甚众，王、公、贝勒等并亦允为保护。”五月上旬，虎神营“人言藉藉，咸谓其尽系团匪。”“凡属满人不分大小老少均系义和团人”<sup>(30)</sup>这除南直隶运动高涨的影响外，主要又在热衷废立的却看上了机会。他们就利用政变前那拉氏制造的“皇上入〔天主〕教，”“吃洋药”说法，“指皇上为二毛，”“总教主”，并以此来要求废光绪。在王公们的煽惑下一般旗人也支持，这就形成五月上旬义和团虽没正式大规模进入北京，那拉氏已深感威胁，才认为“人数众多”，在向她“敌对的示威”，她要设法摆脱王公、旗人，就得逃西安。

这时列强又强行派兵入京，那拉氏也不能不有戒心，如实行荣禄“三路兜截”计划，列强再大举入兵，载漪乘机动手，就更糟，当然要制止。不过她与荣禄所依仗的董福祥这时已被载漪“暗相结纳，引为已用，”荣禄还不赶紧设法调离，自然是一大“失误”，不过载漪的“引为已用”是否就只是为了搞废立，荣禄不调离董军的“失误”有多大，这些要讲清楚还得结合荣禄的另一大“失误”一起谈。

荣禄的另一大“失误”就是他误信了《假照会》，惴惴鼎讲：“廿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袁昶记的也是如此。<sup>(31)</sup>看来此“乃端邸假造”，<sup>(32)</sup>载漪为什么要假造，就在他“盖欲早举非常之事，而事与心违，大欲未遂”，才走的一著棋。这又得通过自五月初七起他与那拉氏、荣禄间的斗争情况来看。五月中旬最突出的情况是，五月十七日义和团正式进入北京，在此之前北京形势尚未紧张，《拳祸记》讲五月十三日“樊（国梁）主教又往使馆，诸西人皆坦然无事也者。”十五日“主教又往使馆，诸西员仍似泰然。”袁昶讲：“十六日城内东西牌楼先见巾带形状不过五、六十人”是在十七日“酉正”“倏聚数千人”突然进入京城。<sup>(33)</sup>义和团是怎样一下子进入北京？乃“团本迎请而来：”“（五月）初七、八至十五团匪出头，十七（日）〔端府〕召见”，“端府召见各师兄，团由是张扬街市”。<sup>(34)</sup>那么载漪为什么要到五月十七日才“迎请”团呢？这又在于载漪所谓的“联拳灭洋，”实际只是利用当时义和团造成的形势来行“大欲”，并不是真支持运动，真要与洋人翻脸，高栢就指出过这点：“端〔王〕亦不信拳，”也不欲“打洋。”<sup>(35)</sup>也就没有必要让义和团入京城，再说他原打算依靠的力量是董福祥，如果董军能进入北京，那么就有对付武卫中军和神机营的兵力，载漪在王公大臣、旗人和虎神营的支持下也就完全有把握动手废立，也不需要义和团入京城。这时客观上也给他机会，五月十三日西摩联军从天津出发，要再次强行入京。载漪就以此为借口，不顾荣禄的坚决反对，在五月十四日硬将董军调入京城，在当时不调董军去西摩联军的行军路线上阻挡，非得调入京城，载漪用心也就可知，不过还未等载漪动手，十五日董军自发地弄出了个杉山彬事件。荣禄也立即借此机会“撤令调驻南苑，董云：从前受中堂节制，此时我面奉谕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荣相已退值，再递膳牌请独对，以太后殊谕出示之，始允撤兵。”<sup>(36)</sup>载漪这才又急了。“通州、武清、永清三处皆为当日（五月十七）承〔端〕邸意调团为虐者也”“乃突闻命之入京，团党本无多人，专人四面招集，始来京城。”<sup>(37)</sup>在董军调入京城，义和团入北京的背后，载漪等人欲“举非常之事”都很明显，龙顾山人在《庚子诗鉴》讲：“是时京辇尚相安，但惧宫廷

有变端，一夕妖氛盈陌，纷纷朱邸设神坛。”这就是指董军虽入城，但未来得及动手，表现还不明显，义和团一入城王公们也公然活动。首先利用那些“迎请而来”的团，“一进城就向三大臣道：我们灭尽诸夷不愿受老佛爷封赏，只要得着一龙二虎的脑袋儿就够了。”<sup>(38)</sup>载漪这时也“在府内邀集亲郡王、贝勒、满大臣等。”他说：“昨天大哥哥儿傅佛设坛请神，请得关公降临，大哥哥儿叩讯二毛子何时除尽，国家何时太平？当时神乩示谕：二毛子虽灭八、九，尚有一龙二虎百支羊，灭尽自然太平。”<sup>(39)</sup>因此许多在京官吏都知道这“一龙二虎”出自载漪：“果闻朱邸有一龙二虎十羊（又曰九羊）之隐语，令人骇愕，宋所闻者，想必此也”<sup>(40)</sup>团尚要“灭尽诸夷”，载漪则认为：只要一龙二虎被“灭尽自然太平”，所以王公大臣会集的结果就只是：“请老团入内查验。”

“五月十八日晨”皇城西安门“双扉紧闭，门外军士鹄立路旁近千人，马数百匹系街之左右，”是载漪在“昨夜子刻”“调至此”，“少选，忽来义和拳一队”，“至则叩门而入，绝无阻之者”，亦“端邸召之也。”“十八夜，家家烧香，喊声动天，令人耸惧，堆拨兵丁传呼西华门调老团焉，是夜有乘黄轿道士自西单牌楼而北。”“端邸引团首四人入觐太后，面奏不愿封官，但愿得一龙二虎三百羊，俾俾心愿足矣。”<sup>(41)</sup>这些都证明载漪硬将董军调入京城，董军被荣禄硬撤出城，载漪又将团“迎请而来”，为的都是“一龙”，“举非常之事”。同样荣禄不过奉那拉氏意旨行事，关键时刻还得靠她“殊谕”，强制性的将董军撤出，现在载漪直接找上那拉氏，她当然也不会屈服。

第二天，五月十九上谕态度明朗了：“鞑鞑之下，扰乱至此，若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凡“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拏获，即行正法”，“首要各犯迅即严拏，不准再事姑息”，“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特令奕劻、载漪、载灃、荣禄负责“督飭”“实力遵行，”除十七日已下令飞调马玉崑“刻日带队”赴京外，这天又著李鸿章、袁世凯“迅速来京”<sup>(42)</sup>那拉氏已下决心镇压京城内义和团，用以对抗载漪的“一龙二虎”，载漪也不会让步：上谕虽令“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撤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城门由其出入官兵任其猖獗”，“盖一言以蔽之曰：有端邸为之护符也。”<sup>(43)</sup>故十九日“匪势愈张”“午前烧西单牌楼绒线胡同教堂，午后烧西交民巷教民房屋。”廿日“焚正阳门四千余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这一天“贝子，贝勒皆大哭”“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拏团也”，尤其是载灃竟上折，声称不能遵十九日上谕，要以董福祥来“妥为招抚”义和团。<sup>(44)</sup>这是个信号：那拉氏如拒绝载灃的要求，他们就可能直接调动董军来武力废立。那拉氏也立即采取了对策，在廿日下午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不仅接受载灃奏请，并令董福祥率领甘军与招募的拳民前往挡西摩联军，袁昶等不知那拉氏真实意图，竭力反对，引得她大动肝火，不久袁昶知道点奥妙：“路西相（按即荣禄）私谓：明料档不住，然令董军出手，则结了。”袁昶是南方人又特地在“则结了”后加“用北音读”<sup>(45)</sup>就充分说明那拉氏与荣禄竟然下决心，宁愿得罪洋大人，也要借西摩联军之手来“结了”董军，从而证实，董福祥确已被载漪“暗相结纳，引为己用”，“用”则为“举非常之事。”两大派的斗争始终环绕在废立上，载漪又面对那拉氏竟要借载灃奏请硬将董军调开，又“事与心违”就抛出《假照会》。可见在那拉氏一时手中别无他军，远水又不解近渴的情况下，董军确成了武力废立，反废立斗争的关键人物，荣禄既未能将董福祥紧紧掌握住，又未能事

先调离，确为一大“失误”，当然至此仍不算完，在此后的斗争中董福祥还要正式登台，就更紧张激烈了。

《假照会》共四条，其中最关键一条是令那拉氏归政于光绪，可见载漪等人的原意：一、第二次废立之所以弄成“只立不废”，那拉氏以“患外人为梗”做借口，载漪等人对此也是有疑问的，她既如此怕列强，如列强要她归政，看她怎么办？二、用此来表明光绪才是那拉氏的最大威胁，既刺激她对光绪的仇恨，又使她面对即将完全失去干预政权的可能，因此，载漪的如意算盘是：那拉氏决不能忍受归政于光绪，她也不敢得罪列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先下毒手，将光绪弄死，溥仪自然继大统，生米煮成熟饭。《假照会》是由荣禄转呈的，倒霉的也是荣禄。

通过《假照会》一事可看出：一、载漪押的最后一宝竟押在假托列强的干预上，这就反映了载漪心目中也认为列强威力无比，也是非常恐惧，因此过去才接受“只立不废”，此时也只能是“亦不信拳，”不欲“打洋”。二、面对《假照会》，“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太后悲且愤”，既反映他俩对列强竟干预她“家务事”，深感意外，也反映对列强的真恐惧，毫无支持义和团，“打洋”之心，《假照会》如由另一人呈递，那拉氏不一定上当，又反映那拉氏与荣禄关系确很特殊，虽故作有分歧但每到关键时刻必漏马脚。

#### 四、“万方有罪，罪在慈禧”

在那拉氏、荣禄误信《假照会》的同时，即五月廿日深夜，列强也在进攻大沽炮台，挑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大派虽因客观条件变化，假借的形式也有所变化，可争“大柄”的斗争不仅没停止，还更激烈。按两大派斗争情况和他们对义和团采取的策略，在从五月廿一日起到那拉氏逃出北京止，这一时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五月底以前为第一阶段，其后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中北京的情况，那拉氏在五月廿九寄《李鸿章等电旨》讲：当时正对义和团“剿抚两难”，而列强又攻占大沽炮台，“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次日《电旨》讲：当时义和团“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勦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并对各督抚“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加以指斥，讲他们“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sup>(49)</sup>到后来又下多次上谕声称：“当围攻使馆之时，拳匪十数万，异常扰乱，虽竭力保护，仍恐或有疏虞”云云，看来似乎是：当时为了外要对列强，内要对义和团，还是严重的内变，只好“因而用之”，怂恿或纵容义和团去攻打使馆，但目的仍在保护使馆，并消灭义和团。虽然，在这些上谕里，那拉氏对义和团的仇恨未加隐瞒。但这正是为了隐瞒“围攻使馆”、“内变”、“因而用之”等等的真象，企图将“围攻使馆”的说成为（也是嫁祸）义和团。但其中的关键仍在“内变”是载漪要搞武力废立，“因而用之”则是将载漪依靠的主力——董军，派去“围攻使馆”，“徐图挽救”虽包括使馆，可为的全是那拉氏死也不能放手的“大柄”，因此“上谕”不得不有些含糊其辞，而我们也不得不从“围攻使馆”具体情况考查起：

袁昶讲：“自五月十九起，至今将议和，枪声不绝，所坏使馆颇有义和团所烧，而〔甘军与武卫中军〕四面繫住，不许义团帮打，是其军打一处便掘一处，搜掠一处。”“遇义和团亦用枪打，而义和团东城遂少”。<sup>(47)</sup>他的说法是与被围困的英公使向本国政府做的报告一致，他说在五月十八日有过义和团“对我们的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我们轻易的击退”，直到五月廿四下午四时整才又开始，但已是“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使馆有组织的进攻”。他还强调说：“没有一个欧洲人（在北京肯定是没有的）曾预见到这件事。”当然这也因为他们原来估计的只不过“那些狂热的暴徒以及他们中间的一定数量的士兵”，差距太大。英公使也报告在第二天（廿五日）使馆中有人“看见一些〔清政府〕部队在哈达门附近对义和拳猛烈开火”，用以“阻止任何拳民来到城墙上”。使馆南面是城墙，上不了城，也就无法攻使馆。

清军中也确有尽力保护使馆的，除了上述“哈达门”——奕劻率领的神机营外，荣禄自统的武卫中军，负责从使馆东、南两面进攻，也是只围而不攻，或向空中乱放枪、炮。但是，从使馆西，北两面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军，进攻不仅是真的，在五月廿四到五月廿八的进攻使馆头五天中，还特别卖力，攻的猛，董军实力消耗也大。英公使的报告中说：围攻的第二天“奥国使馆遭到猛烈的进攻”，“敌人在进攻时特别大胆，随便暴露他们自己，因而遭受相当的伤亡。”接连的几天，华俄道胜银行、美使馆、俄使馆都受到猛攻，地处隐蔽的英使馆也“受到来自蒙古市场的坚决进攻”。<sup>(48)</sup>（英）朴笛南姆威尔在五月廿九日讲：“虽不过五日，俨如历五礼拜，或竟如五月之久”，这几天“敌人则愈胆大，愈威吓，愈欲毁灭予等之地位”，<sup>(49)</sup>董福祥的甘军特点是惯于硬拼，越攻而不克越要硬拼。因而到五月卅日就已“董军精锐顿挫”，还连“伤两健将”。<sup>(50)</sup>鲍心增奏摺讲：董军“东交民巷之役，以万人坐困一隅，伤亡精锐二千以外，得力营哨死者数十，其军由是不振”<sup>(51)</sup>虽讲的整个攻使馆伤亡情况，但在这一阶段，攻的猛还硬拼，伤亡也确最大。

但是董军的猛攻使馆是否就是那拉氏为对付载漪的“内变”才“因而用之”，就又要对当时全面情况加以考查，这要从五月廿一日谈起：

当那拉氏轻信了《假照会》，虽然很惶恐，却也不愿就屈服。当天，她召开第二次御前会，以“国亡在目前，竟若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要“一战而亡，不犹愈乎”。<sup>(52)</sup>竭力争取王公大臣为保她“大柄”一战，企图以此迫使列强能在“归政”上有所让步。不过，也在这天，她在冲动之后又感到《假照会》似与列强对她一贯所持的态度并不相符，《假照会》又不高明，漏洞不少，一经通洋务的许景澄等人指点，她也认为要加以核实。就决定由她的亲信立山，徐用仪（仁和）和联元去访问英公使。第二天，廿二日，袁昶参加第三次御前会。他也看出来“西圣难于持战议考太多，乃命仁和与立山，继往各使馆”，反映了那拉氏从立山对英公使的当天访问中已得知《假照会》的不可信，她主意也变，只是在考虑表面上如何转圜，未等转圜，廿三日收到大沽炮台被占的报告，那拉氏仍打算将各使馆人员送天津，廿四日上午出现克林德事件，当然与使馆间的关系紧张，但是那拉氏为何不赶紧设法去求得解决、缓和，还下令“猛攻”？董福祥又为何特别卖力，必“欲毁灭”？就都在那拉氏了，是她“乃复勃然变计”，“以荣禄总师，立调武卫中军及董福祥所统甘军”“围攻使馆”。<sup>(53)</sup>也是她要董军“建殊勋



以腐懋赏”，特赏董军银十万两。还是她，一再催促董福祥“赶紧办理”。<sup>(54)</sup>要了解当时那拉氏的真实动机，什么是她所说的“因而用之”，就须要了解当时更紧张的另一方情况：

原来也就在那拉氏被骗，一心要与洋人诉之武力讨价还价，要借重王公大臣们时，载漪力量突然变大：一是廿二日因“办军务”颁发了著载漪等人“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的上谕，督办军务处也立即成立。“大事皆督办军务处决”，“自是国事皆载漪决”，<sup>(55)</sup>二是董军调入京城，“屯紮东华门，长安街一带”，载漪梦寐以求的“举非常之事”，真到万事俱备，随时可动手了，这才是真正的“内变如此之急”，那拉氏也真不得不“勃然变计”，关键则在如何牵制并尽力消耗董军实力，就只有“因而用之”——“围攻使馆”了。

那拉氏能达到她的目的在于：一靠荣禄，那拉氏令他“总师”，“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二利用载漪的“大欲”心理，就以“使馆朝夷，皇位夕移”为鱼饵<sup>(56)</sup>，引他上钩。于是在荣禄，载漪双双动员下，加以当时与使馆关系紧张，群情激动，那拉氏的“因而用之”得逞了。董福祥在“召对”时又曾讲过：“五日之内即可（将使馆）攻毁净尽”一类的大话，也被那拉氏这时拿出来，做为迫使董福祥不得不干，头五天还必须拼命攻使馆的口实了。

那拉氏虽尽力促使董军猛攻使馆，但她也真怕使馆被攻破，那样她与列强关系就真破裂，她的政治生命也只好结束，因此她也早安排好保使馆的措施：奕劻的神机营，荣禄的武卫中军就都从使馆的东、南两面将使馆保护起来，让使馆也好集中力量去消耗董军的实力，不过那拉氏还不放心，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使馆：如抽调董军。五月廿七她下上谕：“董福祥现在所办之事著赶紧办理，腾出兵力前赴天津勤办，并迅飭姚旺先往天津助战。”放手武卫中军、董军去抢劫银行、商店、平民，直到官吏住宅。弄得“董军专以焚杀为事”，还极其残暴，“将商民枪毙，抱其金银，淫其子女，出鬻焚其屋宇，哭声闻数里。”<sup>(57)</sup>又用荣禄在供应上卡董军，至使经常“子药断绝”，“干脆拒绝批准〔甘军〕使用他〔荣禄〕的后备炮”；<sup>(58)</sup>挑拨余恩虎等人与董福祥闹矛盾。所有这些都大大削弱了董军的战斗力，也就保护了使馆，到了五月廿九“董军精锐顿挫”“五天”的期也到，那拉氏下令“停战”，使馆得到喘息，休整，更难攻克，赫德也在被围中，他总结为：“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事后那拉氏也讲：是她“处处留有余地”，“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来的道理。”<sup>(59)</sup>倒是董军既“顿挫”，又被使馆牵住，反“坐困一隅”，从此武力废立可能日小。

义和团到六月初一也有少数去打使馆，但英公使说：是“在中国军队的逼迫下发动进攻”的<sup>(60)</sup>。在五月底京城义和团主要与两件事有关：一是那拉氏既不给予任何武装，又让义和团去打西什库等教堂，自然伤亡很大而无效，显然也是在借洋人的枪炮屠杀义和团。再就是载漪看到攻克使馆希望不大，就又“谄言上奉天主教，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sup>(61)</sup>不过载漪只靠自己那点兵力与义和团就只有失败，跟着去“大索”的义和团还被那拉氏杀害。这些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京城义和团人数虽不少，但仍不足以威胁那拉氏。

那拉氏攻打使馆并不是真要与洋人决一死战，还可从她廿四日下令攻打使馆前颁发